

元儒熊禾的传记问题

朱鸿林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一、前言

熊禾(1247—1312)是元代福建的著名儒者,他生于朱子的本邑建阳县,宋末登科入仕,宋亡隐居不出,长期在崇安、建阳二地讲学授徒。熊禾为学私淑朱子,以阐发朱子学术和尊崇朱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道统为职志,卒后配祀于建阳朱子祠,传记见于《建阳县志》、《建宁府志》等书。熊禾有关儒家道统的议论和学校孔庙祀典的主张,在后代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本人在明代成化年间也被请求从祀孔庙,只是没有成功而已。

熊禾著述甚多,门人也不少,但因他成熟于宋亡之时而又不仕新朝以终,门人也没有在政学两界显名的,以故他虽名列乡贤,却在《元史》没有传记。后来著作逐渐亡失,他的学术也就没有引起乡邦以外的更多注意。像万历年间冯从吾所著的《元儒考略》,便没有把他记载在内。但他对于朱子学术的致力,其实却为后代识者所一致承认。明代嘉靖中晚期朱衡著的《道南源委录》、杨应诏著的《闽南道学源流》,清康熙间黄宗羲著的《宋元学案》和乾隆间李清馥著的《闽中理学渊源考》等书,都有他的传记或学案。可是,这些传记所根据的文字,既伤于简略,也有明显的失误,对于熊禾的学术背景和重要主张,都不能提供正确而足够的资讯,也没有说出熊禾议论对后世的影响所在。近年的《福建朱子学》一书,虽然也为熊禾立了专节讨论,但主要处理的是熊禾的哲学思想和观念,对于他的传记和学术活动的叙述,仍是沿袭旧说的^①。

本文将熊禾传世的文集为素材,对熊禾的传记加以订正补充^②。讨论还包括了熊禾传记资料本身的问题和熊禾的历史待遇^③。

二、熊禾的传记资料检讨

熊禾《元史》没传,现存最早的成篇传记,是倪处约所撰的《勿轩先生传》和李让所撰的《题勿轩先生行状》,两篇都收在《熊勿轩先生文集》的附录之内。倪氏撰传也见于嘉靖《建阳县志·艺文》卷中。此后明清两代福建省府县志以及学案体裁史书的熊禾传记,基本上都是这两篇的简化。按照传记体裁和具体的内容来看,这两篇文字应有更原始的行状及墓志铭为其依据,但这些都没有流传下来。

倪处约的《勿轩先生传》，看来应该作于永乐初年以前的明初时代。此传末段记熊禾生卒年份、歿后地位以及作者署名的文字如下：

先生生于宋理宗淳佑七年丁未，即元定宗之二年也，卒于元仁宗皇庆元年十月二十九日，葬于鼇峰之横历，寿六十〔有六〕^④。从祀于文公之祠，而位尊先贤之列，非幸也，宜也。前翰林倪处约述。

这样的措辞，既特别著明宋历所当的元代年号，又却只白书元帝年号和前任官衔简称，最像出于明初的元代遗臣手笔。倪处约之名，不见于黄佐的《翰林志》，可见“前翰林”正是前朝亦即元朝翰林之意。

按倪处约，元明登科录、地方志和文集都没姓名可考，有可能是易代改名或隐名用字之故所致。倪氏本是西域高昌望族，世为回纥贵臣。元代有合刺普华，《元史·忠义传》有传。其人及子孙均华化甚深，曾为陈垣所表述^⑤。合刺普华生二子，长曰倪文质，次曰越伦质。据元人欧阳玄《高昌倪氏家传》，倪文质“引年休致，家于豫章东湖之上”，有子五人，与越伦质之子一人，均成进士。这六人的登科年份及履任官职，欧阳玄文均有记载^⑥。后此的倪氏子孙名字和仕历，元人黄潜的《合刺普华公神道碑》和清人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也有所记^⑦。其中倪文质孙一人，越伦质孙二人，亦登进士。这些人物的名字和世次，都见于钱大昕的《元史氏族表》^⑧；陈垣也有“倪氏一门九进士图”^⑨，据以得知他们的登科年份，始于延佑二年（公元1315年），终于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

这九人之中，曾官翰林者四人。其一为倪玉立，字世玉，号止堂（或止庵），乃倪文质长子，延佑五年（公元1318年）进士，曾官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⑩。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任泉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闽中金石略》有石刻资料可证^⑪。《泉州府志·职官表》列名元代达鲁花赤最后一名^⑫，有传。其二为倪朝吾，倪文质第四子，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进士，曾官翰林待制，历官至济州同知。其三为倪列旒，倪文质第五子，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进士，曾官翰林待制，至正中任河南路经历，红巾陷其城，投井死。最后为倪百僚，字公远，倪文质第三子倪哲笃之长子，至正五年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红巾之乱，避地高丽，改名逊”，“遂留高丽不归”^⑬。

以上四人之中，与熊禾的活动地域和学术旨趣可能有关的，只有倪玉立其人。《泉州府志·名宦传》据《闽书》载：倪玉立监泉州时，“兴学校，修桥梁，赈贫乏，举废坠，考求图志，搜访旧闻，聘三山吴鉴成《清源续志》二十卷。郡人蔡元年十四，有神童称，玉立优礼之，驿遣京师，朝授编修，郡人皆劝于文学。士民立祠祀之”^⑭。显然他是一名留心文教的长官。他的诗作见录于顾嗣立《元诗选·癸集》，“具《金台》、《雁门》诸集风度”^⑮，文采可观无疑。《勿轩先生传》如果说是倪玉立的作品，看来也无不可。况且“处约”二字的涵义，与“止堂”或“止庵”这个别号的涵义，也还有可配合之处。但若从生存年代来考虑，则倪玉立之为倪处约，却显得甚不可能。倪玉立延佑五年（公元1318年）登科，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任官泉州，至元亡之年（公元1368年），年龄至少已在七十之上。府志既说“士民立祠祀之”，可见他曾离任他去，不以身终该地。

考倪氏人物之中，还有倪玉立的三弟倪哲笃的第三子倪帖该其人，是“乡贡进士”，至正九年时“为翰林国史院译史”^⑯。以译史小官为名贤作传而自书“前翰林”，似乎不像，但这若和熊禾从祀朱子祠一事一并考虑，则又不无可能。嘉靖《建阳县志》关于朱子祠，有如下的记述：

至正八年,知县辛思谦因殿庑颓朽,重修复之。洪武二十八年,主簿丘松重新……〔大成〕殿后建明伦堂。堂后为中堂;堂后立东西斋,曰进德、曰育才;又后为讲堂;左饌堂,右先贤祠,祀朱子,以蔡西山〔元定〕、黄勉斋〔干〕、刘文简公〔钥〕、真西山〔德秀〕四先生配,为五贤堂^⑩。

可见洪武二十八年时,熊禾还未从祀于建阳的朱子祠。俛传所说“位尊于先贤之列”之事,自然也在其后。同志《祀典·大儒祠》条记,此祠嘉靖十年立,“祀朱文公,游文肃公〔酢〕等七贤,……以黄勉斋、蔡西山、刘文简、蔡九峰,熊勿轩配”^⑪。可见熊禾后来实有配祀朱子之事。大儒祠所给予熊禾的地位,应属相沿有自,可反见前此熊禾必已祀于朱子之祠。从俛氏人物的年代来看,曾官翰林国史院译史的俛帖该是最可能的了。他年纪较轻,“前翰林”属于他可署的官名,也有足够的家庭渊源和社会关系去做熊禾此传。据黄溍所记,俛帖该还有三个至正九年时为“国学生”的弟弟,名叫俛吉思、俛赉、俛弼。他们也有后来任官翰林院的可能,但于文献已无可稽。“处约”可能是俛帖该或其弟之一的别字,也可能是他(们)易代之后的改名,正如其兄俛百僚元亡之后避地高丽,改名俛逊一样。这样推算,熊禾之从祀于朱子祠而“位尊先贤之列”,其事当在洪武末年至永乐初年之间。

李让所作的《题勿轩先生行状》,只算是行状的补充,并非行状本身。此文末句署“建宁府训导天台李让撰”。查《建宁府志》,李让名见《职官·训导表》中,该表录至嘉靖十六年任,共有四十六人,第三十六名起注“正德间任”,李让名列第十,名下首注“永乐间任”^⑫。看来他是永乐初年任官建宁府学训导的,他作题后文的时代,和俛处约作传文的时代,相距不会太远。

以上的考论,显示了现存的熊禾传记,都是明代的二手文字,作于熊禾卒后九十年以上,记述或有失实,亦属在所难免。像把熊禾的学术说成出于朱子之门人辅广,更属错误之大。俛处约撰传的用处,是提供了熊禾的生卒年份和家世、科第年份和任官职历、一二交游的情况以及他为世所称道的名句。李让题后的用处,是提供了熊禾著作的名称及其在明初的存世情况。二文以外的,都是以称引熊禾讲学著书成就的说话为能事。

后此而作的熊禾传记,也都没有新意。只有《宋元学案》和《闽中理学渊源考》对熊禾的师承问题提出过质疑和错误的考误^⑬。要了解熊禾的生平,固然还要利用俛处约和李让之作,但主要则须依靠熊禾自己的文字。下文便是根据内容可以互补的《熊勿轩先生文集》和《勿轩集》二种所载为主,来勾划出熊禾的生平大概。

三、熊禾的生平和历史待遇

熊禾,福建建宁府建阳县崇泰里人,初名秣,以禾名登进士第,字位莘,一字去非,号勿轩,又号退斋,宋理宗淳佑七年(公元1247年)生。父学显^⑭,母同邑麻沙镇刘氏。熊、刘二族同于唐末入闽,皆为建阳望族^⑮。熊氏入闽之始祖为熊秘,因避黄巢之乱,由江西南昌徙建阳。熊秘之子熊衮,唐昭宗时官至兵部尚书,以孝友闻^⑯。熊禾是他的十六世孙^⑰。熊秘定居建阳崇泰里后,建有家塾,其地在乡之鼇峰,后代演成鼇峰书院。熊衮四世孙为熊知至,宋仁宗天圣年间五领乡举而不第,归隐于乡,以诗名,著有《鼇峰隐人集》^⑱。

后人传至南宋,有熊庆胄,号竹谷,是为熊禾的从伯父。庆胄早年受学于朱子门人蔡渊,后又从朱子再传门人真德秀等问学。为人孝友,笃于乡党情义,捐其岁收之半,“创敬

思斋，以训后进”，谨于礼节。“壮岁即弃科举，一意通经博史之学”。远方有来其家居处从游的，“必竭力馆谷之”。熊禾年六岁，就读于敬思斋，“已蒙公（庆胄）器许”^⑧。

熊禾另有族叔父熊节，字端操，号复斋，是朱子的门人，登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进士，官至县丞^⑨。宋度宗淳咸十年（公元1274年），熊禾年二十八岁，登进士第。同年自杭州侍熊节归乡，论及熊庆胄遗事，“怆然兴念，求所以嗣成公志者”^⑩。所谓公志，指的是博通经史的著述事业。熊节归里后，修理鼇峰书院，以延师友，但不久逝世^⑪。熊禾早年的学问，无疑曾受这两位从族伯叔父的影响，他和朱子的学术渊源，是起于家庭而渐于乡党的。

熊禾成进士之前，曾自言“少孤无似，从乡人习举子业，未知学为何事也。年逮弱冠，读《大学》，玩索有得，始喟然叹曰：学在是矣。自此益穷研《四书》，以及诸经，务为明体适用之学”。后“因与计偕，游行都”，虽然应试下第^⑫，却因得“游浙中，受业于刘敬堂先生，得闻文公晚年所以与勉斋黄先生〔干〕、潜室陈先生〔埴〕论学之要旨”^⑬。这是熊禾深造于朱学之始。刘敬堂永嘉人，熊禾从他处得闻经济之学。熊禾的其他老师，还有精于《易》学的朱子再传人徐几^⑭。

落第归乡之后，熊禾开始授徒讲学。二年之后，熊禾秋试举于乡。大概他的答卷直言无忌，无意得售，故中举后有书致谢举主，并论自己的学问兴趣和心得。此时他的学术事业有二：其一是“欲仿文忠公真西山先生《〔大学〕衍义》，只就学者分内事，辑为后传，以见明体适用之学”。另一是继续他二十一岁时已经开始“仿《〔通鉴〕纲目》，以左氏书实其事，以公〔羊〕、穀〔梁〕、程〔颐〕、胡〔安国〕诸家之说足其义”的《春秋》传义工作。熊禾自觉“时事已矣，某自度必无所用于世”，已有脱去场屋之累，“沈潜古书，自求切己受用”之想^⑮。但他仍然再出应试，且在元兵渡江前二年成为进士。

熊禾登第后，授邵武军司户参军^⑯，但在官最多一年，元兵已于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一月攻陷临安，宋恭帝出降北去。此后端宗被立，改号景炎。是年建阳亦遭兵火，熊庆胄的著作多种和熊禾用功九年已经成稿的《春秋通解》一书，均遭焚毁^⑰。此时熊禾年三十岁，自感“奈何太母、少帝、三宫俱已屈膝，己卯（帝昺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皇纲弗振，无策匡救，是乃天地间一罪人也”^⑱。于是决志专心讲学待后。己卯之前二三年间，他是否仍然奔走在官，已不可考。此后数年，他曾住在崇安翁坊的洪源地方，并筑长林书院讲学^⑲。

三十八岁起的十二年间，熊禾都住在武夷山读书讲学^⑳。曾在武夷五曲晚对峰之左，筑洪源书堂，从游者数十人，有远自江左、东吴、漳、泉等地来的^㉑。他的交游相好之中，包括著名的谢枋得（号叠山）。谢氏曾自江西到访，共诉宋亡之恨^㉒。和熊禾研讨经学的，则有婺源胡一桂（字庭芳）。胡一桂曾经三访熊禾，头二次都在熊氏居于武夷之时。第一次是熊氏三十九岁该年，胡氏来居洪源书堂三月，二人相论胡氏所精的《易》学，熊氏并为胡氏之作做了评语。他们又论朱子学术，相约重新研究熊禾遭兵火所毁的《春秋》之学。第二次是熊氏四十三岁该年，胡氏居于洪源，又同游建阳的云庄（书院），一共留了十个月。这次讨论了从事朱子学所最应做的事情以及熊氏自己的《春秋》传义之学。此时熊禾已经著有“《帝王大纪》一编，托始帝尧元载，下逮威烈王二十二年，以为古今一部通史”。胡一桂其时亦著《史纂通要》，熊禾曾以所著借他参考^㉓。在武夷山十二年间，始终从学的，则有《翰墨全书》的编纂者刘应李（号省轩）^㉔。同一时期内，熊禾又曾经“经理”（主要是翻

新修筑)过武夷书院和建阳县学的事情^⑨。

熊禾五十岁那年,返回故居,“归麓峰书院聚徒”^⑩。并“剔小精舍,中为孔子燕居之堂,配以颜、曾、思、孟,次以周、程、张、朱,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晦庵五先生”^⑪。孔子五十一代孙元敬为之书额作“道源堂”。堂左为“朱文公道义之祠”,右为“南昌熊氏忠孝之祠”。门外又建两坊,左曰“道学”,右曰“忠孝”^⑫。扩充后的书院,“以其门对云谷,而又寓文公没而道之传在于是”之意,改题门匾为“云谷书院”^⑬。新构落成后,熊禾自谓“远近士友咸集,行舍菜礼”,以对他自己所厘定的道统表示隆重之意^⑭。

熊禾归里后的讲学重心,有所谓“求仁约”者,目的是求致可措诸行的《大学》之道,主要讲究的是《三礼》之学^⑮。五十五岁那年,熊禾又为重建建阳书坊的同文书院一事出力,既作建筑的募捐疏,又作书院的上梁文^⑯。是年胡一桂第三度来访,二人相约完成朱子及“门人三世未了之书”的《三礼》之学。至此,熊禾与胡一桂论学前后已经十七年,他们从论《易经》开始,“又复相与推究文公所论他经大旨。”结果熊禾在《易》、《诗》、《书》三经均有“就绪”之作,国破时被毁的《春秋通解》也得以“重纂”。熊禾晚年送别胡一桂时,称胡氏是他的“斯文异姓昆弟”^⑰,以友辅仁的意义和功效,其大可知。

从五十五岁该年的冬天起,到五十八岁该年的秋冬,熊禾南游在外,历泉州、同安、福州、福清、永福、莆田等地^⑱。这三年之中,他曾为福州郡学的五贤祠作记,连带著论了影响远大的学校《祀典议》^⑲。他的议论要点是,道统的正传,只应包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和宋代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子,而朱子曾推崇的邵雍和司马光不应算入其中;天子应该以孔子以上的圣人为师,特别祀于太学,而以圣王的贤臣为配;学校通祀孔子,天子应当春秋释奠于先师;孔庙的四配应该相对坐向,十哲应该考虑调整,七十二子不必一定从祀,马融、杜预、王弼、扬雄、荀况这五名唐宋时代从祀的儒者应该罢祀,董仲舒、杨时、李侗、黄干等汉宋儒者应予从祀;父子同在孔庙配祀之列者,应该分堂而祀;各地学校只应一律祭祀孔庙所奉诸儒,地方有道德的乡贤和对地方有贡献的官师,应该分别另祀。这些主张,除了十哲的调动和七十二子的免祀两项外,都在明代先后获得采纳,成为制度,并且为清代所继续遵行^⑳。同时间内,熊禾又摹刻朱子所创始的《仪礼经传通解》,以“考亭诸名儒参校订定墨本,拟就书坊版行,以便流布”^㉑。

五十九岁该年元旦在麓峰书院会拜时,与会的门人还有五十五人之多^㉒。是年前建宁府判官、现南剑州同知毋逢辰(号梅庵)要为建阳的考亭书院增置祀田和设立义学,熊禾为他作募捐疏^㉓。义学成立后,熊禾又应邀为其“小学师”。六十一岁该年,熊禾为整个建阳考亭书院的修复扩充事情,作了著名的《考亭书院记》,给朱子赋予了文化史上仅次于孔子的地位,并寄望于元朝大兴朱子学术之事。此文的开篇名句:“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朱子生。”^㉔据说曾大为吴澄所称服,认为“江南有人”之证^㉕。熊禾此后的主要工作,是以《仪礼》为主的礼经修订著述,书未成而卒^㉖,卒于元仁宗皇庆元年,享年六十六岁,距临安沦陷三十六年,距崖山国灭三十三年。

熊禾博学能文,倪处约撰《传》说他“博通《五经》,遍览诸子百家语,下迨医卜阴阳之秘,故下笔成文,追踵韩、柳”。又说“当时远近以书厨目之”。从熊氏文集的内容和文章艺术,以及他的著作名目和现存内容看来,这些说话都属信而有征。熊禾一生著述丰富,而以儒家经典的训解为主。他的友人史药房曾述及他的著述形式和方法:“如《易》、《诗》、《书》、《春秋》,皆为之集疏。集疏云者,每经取一家之说为主,而裒众说以为之疏。工夫

浩博、义例明畅。……复为《小学》、《四书》集疏，以羽翼之。”^⑩这些“集疏”式的经学著述，包括了《四书标题》、《周易讲义》、《大学广义》、《三礼考异》^⑪、《大学口义》、《尚书口义》、《书说》、《春秋通解》^⑫等名称可知的。此外“《孝经》有序，《小学》有解”，则书名未详^⑬。史学方面的著述，有《帝王大纪》和《通鉴广义》^⑭。熊禾编纂的书籍，有《诗选正宗》^⑮和“取文公诸书，择其精且要者为一编，而以邵（雍）、马（司马光）、张（栻）、吕（祖谦）及朱氏门人之说为附录”的《文公要语》^⑯。

以上的各种著述和编纂，随时代而渐亡失。明代嘉靖《建宁府志》列出“今行于世者”，只有五种^⑰。民国《建阳县志》列名十六种，能注明卷数或指示可能存在的只有三种，包括文集在内^⑱。现存有书可见的，除了明成化三年始编成刊的文集《熊勿轩先生文集》之外^⑲，只有四种。卷帙完整的，是《易经训解》和《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已经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之中。残存的有《文公先生小学集注大成》和《四书标题》，都是阙缺太甚而稀罕难见的^⑳。

熊禾的经学著述，基本上都是补充和订正朱子经说之作。他这是有意的羽翼朱学，但其实正是他的学术思想的体现。熊禾主张的学术，是北宋胡瑗湖学设教的所谓明体适用之学和朱子所强调的所谓全体大用之学^㉑；亦即一种准古酌今，有据于经而可见于行的社会属性学问。这种学问以儒家经典的道理为根基，以经史时务实学知识为内容，以礼制的建行为发用。宏观地看，它仍是通经致用和经术以经世的汉宋传统思想的延续体现。经学终归是治道的根源，也是儒学的基础。这在熊禾来说，是笃信无疑的。他有这样的名言：

秦汉以下，天下所以无善治者，儒者无正学也。儒者所以无正学者，《六经》无完书也。《六经》无完书，则学不可得而讲矣；儒者无正学，则道不可得而明矣。千五百年，牵补架漏，天地生民何望焉！^㉒

可见，除非经学真的完备纯正，治道决无通明之理。反之，完整《六经》而为之讲明，正是儒者寿世的功行所在。在熊禾看来，朱子的真正伟大之处，也正是他对此理的真正识认和认真践履。但朱子其实未竟其业而卒：

考亭夫子集正学大成，平生精力，在《易》、《四书》。《诗》仅完；《书》开端未竟，虽时之门人九峰蔡氏，犹未大畅厥旨。《三礼》虽有《通解》，缺而未备者尚多，至门人勉斋黄氏、信斋杨氏，粗完《丧》、《祭》二书，而授受损益，精意竟无能续之者。若《春秋》，则不过发其大义而已，岂无所俟于来学乎？当吾世不完，则亦愧负师训多矣^㉓。

熊禾认为最有意义而急切之事，便是继成朱子之志，疏通其已成之说而补备其未成之书。其结果便是如上所述的行事和著述。

熊禾对于朱子学尽心的意志和意义，以及其成就之所至，他自己的诗句便有很好的述评：

扶偏须忠臣，邪说可无距！同志来此游，兴言激余素。礼乐愧河汾，兴唐竟谁予？^㉔

他要力作朱子的“忠臣”，并要私人聚徒、讲明朱学以兴盛世。就其所至而言，他只成就了前一事，虽则他的孔庙祀典议论曾经影响后世甚大。熊禾的门人陈蒙正曾以朱子的“孝子”来形容他^㉕。清儒张伯行更说他是朱子的“功臣”^㉖，这些都是善于形容的信辞。但孝无多少之别，功则有小大之分，熊禾以亡国不事新朝，形迹不免隐晦，身后著作渐失，知见

者少，其经说因而没有像吴澄的一样，产生远大的影响。他获得的历史肯定，因而主要仍在乡邦之地。

熊禾歿后，他的书院仍称鳌峰书院，后来加建“传衷堂”以祀他本人^⑧。明朝开始，“士子皆居泮宫，而各书院渐至寝废”。鳌峰书院也不例外，“为风雨侵袭，鞠为茂草”。到了永乐初年，更被势家侵占基址。直到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熊禾的六世孙诉于按察司官，次年才奉部命重建，又次年邑人丘锡为作书院记，冀望朝廷承认熊禾为“有功德于纲常”的“先贤”，而“免其子孙之差徭”^⑨。书院后来复圯。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朝廷从博罗县儒学训导游宣之请，议熊禾从祀孔庙之事。结果以其经说“议论详密，造詣精深”未必能及吴澄等原因，没有通过，只命本属府县增祀熊禾于该处的先贤祠或别立祠堂致祭^⑩。成化六年，书院遂有重建之事，也自此成了熊禾的专祠所在。此后成化十年有重建门外二坊^⑪，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有重修书院等事^⑫。

上文说过，洪武末年至永乐初年期间，熊禾已获祀于建阳的先贤祠，和黄干、蔡元定、蔡沈、刘钥四人一起配享朱子。黄、刘、二蔡四人都是朱子的高第门人，蔡元定更兼朋友辈份，熊禾能以三传甚至四传门人之名、私淑后学之实，和他们并列享祀于朱子之祠，这是后人对他有功于朱子的明确承认。嘉靖十年（公元1515年），建阳建大儒祠，祀朱子和游酢等七贤，仍以黄干、蔡元定、刘钥、蔡沈和熊禾五人配享^⑬。大儒祠万历二十五年前后扩建，从祀朱子者增为二十人，熊禾位于末位，显示了他被肯定为朱子最后重要传人的地位不变。此祠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改为义学，但原来所奉的诸儒仍获祭祀^⑭。

四、结 语

熊禾以朱子的三传乃至四传门人之名、私淑后学之实，自称要做朱子的忠臣，时人观其所行而称他为朱子的孝子，后人核其所得而称他为朱子的功臣。这所反映的，正是一个立志从事朱子学术者的言行一致表现。熊禾有功于朱子之处有二：其一是论成自尧舜至程朱的所谓道统正传，使朱子成为孔子之后最伟大的“正学”集大成者。其二是以经籍的训解具体地对朱子的经学体系加以整补充实。他的毕心于朱子之学，和他坚持朱子之学确实攸关世道的信念是分不开的。

熊禾以胜国进士而选择不仕新朝、隐居聚徒，理由是不能以利益之说解释的，因此他的“以道自任”，也就不能以学派门户或乡党情结说之。他的动力来源，其实是他那种只有经具完书才能讲学得正而治道得明的思想。在他的想法中，朱子的伟大贡献正在于使那些有缺憾的经典获得完整的文本和义训，因此惟有完成朱子未竟其功的经学事业而使之昌明于世，明道致治才有可能实现。这思想的实践，便是他笃志守先待后的讲学和著述事业。熊禾自身不仕元朝，却不因而望道不明不行于当世。所以他能以忠于朱子之学为务，同时也能称赞仕于元朝的许衡之能倡明朱学，且因之而在政治上作出贡献。他的文化襟怀无疑是阔大的。

熊禾关于学校祀典的议论能够演成后代的制度，可见他的见解高明、厘然有当于人心。我们因此可以想像，他的经义训解也必多自得之说。刘思生举过《四书标题》内的一些例子，认为“皆有卓见”^⑮，只可惜熊禾的著述因他隐居无位而已多失传。但他对朱子的尊崇和对所谓全体大用之学的反覆强调，对于后代学术实仍有所影响。熊禾曾欲就“学者分内

之事”补充真德秀的《大学衍义》而为其“后传”，此事未见其成。但明朝中叶的丘浚（公元1421年—1495年）却真的著成了《大学衍义补》，为学者提供了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并且认为有此补足，才能使“大学”真正成为全体大用之学。熊禾的道统相传之说和“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的名句，也都见于丘浚所辑《（朱子）学的》一书正文之前的图像上^⑨。由此可见，熊禾对于后代善学朱子的学者的影响也还不少，而他所体现的补充朱子之学、使之体系趋于完整的学术，也一直延至明代中期还未断绝。

注释

- ①高令印、陈其芳：《福建朱子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9—194页。
- ②本文采用的熊禾文集为《丛书集成初编》据《正谊堂全书》本的六卷本《熊勿轩先生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八卷本《勿轩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参考的传记出处主要包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版）本，郝维岳修、汪佃纂；嘉靖《建宁府志》卷一八以及冯继科等纂修；嘉靖《建阳县志》卷一二；赵模修、王宝仁纂；民国《建阳县志》卷十（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朱衡：《道南源委录》卷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庄严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版）本；以及杨应诏：《闽南道学源流》卷一六；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六四，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各处的熊禾本传。其他考订的参考文献，随文见注。
- ③熊禾的学术思想细节、师承问题辨正、文集的刊行情况和明人提名他从祀孔庙的始末，本亦属于讨论范围，限于篇幅，将在另文《元儒熊禾的学术思想问题及其从祀孔庙议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出版《史藪》第三卷（1998）待刊稿）中讨论。
- ④此处明显错误。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664页，“熊禾”条亦沿而未正。
- ⑤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摩尼教世家之儒学·高昌契氏》，励耘书屋1934年版。
- ⑥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一十一，《高昌契氏家传》，《四部丛刊》本。
- ⑦黄滔：《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五，《合刺普华公神道碑》，《四部丛刊》本；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五《哈刺普华传》，（台北鼎文书局1980年影印原刊本）。
- ⑧钱大昕：《元史氏族表》卷二，《广雅书局丛书》。
- ⑨陈垣所列图，见注⑤。契氏人物科名年份，也见于范涑修、章潢纂：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一七，《科第》。
- ⑩此段所叙契氏各人传略，除别注出处者之外，均据上引欧阳玄、黄滔、屠寄三人所作。
- ⑪陈槩仁辑：《闽中金石略》卷一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版，《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影印《菽庄丛书》第二种本。
- ⑫怀荫布修、黄任纂：同治《泉州府志》卷一六。
- ⑬《蒙兀儿史记》卷四五。
- ⑭《泉州府志》卷二九。
- ⑮《闽中金石略》卷一二。
- ⑯《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五，《合刺普华公神道碑》。
- ⑰⑱嘉靖《建阳县志》卷五，《学校》。
- ⑲熊禾师承问题，清人考论未见其是，《元儒熊禾的学术思想问题及其从祀孔庙议案》文中有详细分析，本文只书其应予从信的。
- ⑳《熊勿轩先生文集》卷六，倪处约撰：《勿轩先生传》。熊禾崇泰里人，见同书李让撰《题勿轩先生行状》。

- ②②《勿轩集》卷三，《麻沙刘氏族谱序》；《熊勿轩先生文集》卷三，《麻沙刘氏族谱》。
- ②③民国《建阳县志》卷一一，《孝友传·熊袞》；《熊勿轩先生文集》卷二，《熊竹谷文集跋》。
- ②④倪处约撰：《勿轩先生传》。
- ②⑤民国《建阳县志》卷十，《独行传·熊知至》。
- ②⑥《熊勿轩先生文集》卷二，《熊竹谷文集跋》；民国《建阳县志》卷十，《理学传·熊庆育》。
- ②⑦民国《建阳县志》卷十，《儒林传·熊节》；刘树勋：《闽学源流》，《朱熹门人录》，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63页。
- ②⑧《熊勿轩先生文集》卷二，《熊竹谷文集跋》。
- ②⑨③①①《熊勿轩先生文集》卷六，丘锡撰：《鳌峰书院记》；卷五，《谢乡举论学》；卷一，《送胡庭芳序》。
- ②⑨刘敬堂有传见于《宋元学案》卷六四，《潜庵学案》之内，所据即是熊禾文字，但系于辅广门下，是沿旧说之误。本文所据熊禾二师资料，出于《续修四库全书》第2册本熊禾《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书前清人抄录的“元刻本董真卿《周易会通》引用诸书群贤姓氏”。详细考论，见《元儒熊禾的学术思想问题及其从祀孔庙议案》文。
- ③③同注③①。熊禾二十一岁开始《春秋》传义工作，参看注③①。
- ③④熊禾登第后，倪处约《勿轩先生传》说他“授宁武州司户参军”，李让《题勿轩先生行状》则作“任汀州司户”，吴高熊氏文集序（即依托为许衡所作该序）则作“授邵武司户参军。按：宋元二代均无宁武州之置，汀州也只有宁化县，吴高所记为是。注③②所引熊禾《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附见资料正作“邵武军司户”，本文从之。邵武在宋为军，方位可参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图67—68，南宋福建路图；第七册图27—28，元江浙行省图。
- ③⑤③⑥《熊勿轩先生文集》卷一，《送胡庭芳后序》；卷二，《熊竹谷文集跋》、《蔡氏春秋后序》。
- ③⑦同③⑤。
- ③⑧熊禾三十八岁起入武夷山，见《熊勿轩先生文集》卷一，《送詹君履学正序》。
- ③⑨同注③⑤，卷六，史药房撰《送勿轩先生归武夷序》，亦有提及。
- ④①倪处约撰《勿轩先生传》。熊禾提及与谢叠山之徒交游的文字，见《熊勿轩先生文集》卷一，《赠地理吴竹涧序》；卷二，《江氏族谱序》；卷二，《跋交信录序》；卷六，胡潜斋撰：《与退斋论学》。
- ④①同上书，卷一，《史纂通要序》、《送胡庭芳序》、《送胡庭芳后序》。
- 按：学者的胡一桂，宋末元初有二人。和熊禾讲学的，是婺源人，字庭芳，精于《易》学，《宋元学案》卷八九《介轩学案》内有传。另一是永嘉人，字德夫，精研《周官》，同书卷六五《木钟学案》内有传，是陈埴的再传门人，在学脉上和熊禾也有渊源关系。
- ④②《熊勿轩先生文集》卷一，《翰墨全书序》。
- ④③《勿轩集》卷八，《经理武夷书院》、《经理建阳县学》。
- ④④《熊勿轩先生文集》卷一，《送夏思学归江东序》。
- ④⑤同上书卷三，《三山郡泮五贤祠记》。
- ④⑥嘉靖《建阳县志》卷五，《学校·鳌峰书院》。
- ④⑦倪处约撰：《勿轩先生传》；丘锡撰：《鳌峰书院记》。
- ④⑧同注④④。舍菜礼所作祭文，见《熊勿轩先生文集》卷四《鳌峰祭先圣文》。
- ④⑨同上书卷五，《虞彦忱字说》；又，注④④。
- ⑤①同上书卷四，《重建建阳书坊同文书院疏》；卷五，《建同文书院上梁文》。
- ⑤①同上书卷一，《送胡庭芳后序》。
- ⑤②熊禾南游踪踪，见同上书卷三《晋江县学记》；卷二，《跋谢春堂诗义后》、《跋林氏兄弟遗事后》；卷五，《张以谦字说》；卷六，陈蒙正撰：《送退斋东归序》。《勿轩集》卷八，《别福清诸友》；卷八，《别永福诸友》。

- ⑤③《熊勿轩先生文集》卷三，《三山郡泮五贤祠记》；卷四，《祀典议》。按：《祀典议》文，《勿轩集》卷2附《三山郡泮五贤祠记》后，不另标题。
- ⑤④熊禾学校祀典议的后代体现，可参看《明史》卷五十《礼四》“圣师”、“至圣先师孔子庙祀”及《清史稿》卷八四《礼》三“传心殿”、“至圣先师孔子”、“启圣祠”各条。
- ⑤⑤《熊勿轩先生文集》卷四，《刊仪礼经传通解疏》。
- ⑤⑥《勿轩集》卷八，《乙巳元旦鳌峰书院会拜五十五人》。
- ⑤⑦《熊勿轩先生文集》卷四，《代毋梅庵题考亭书院祀田疏》。题疏时间见同书卷三，《考亭书院记》。按：“毋梅庵”之姓，此集排印本皆误植为“毋”字。
- ⑤⑧同上注，《考亭书院记》。
- ⑤⑨倪处约撰：《勿轩先生传》。
- ⑥⑩《福建朱子学》第194页，说熊禾有《三礼考异》二卷，“系未完书，陈一方续完”。未知何据，也未见注明存佚藏收情况。《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七，作“修《仪礼》，未及成而卒，福宁陈益方足而成之，以为《礼编》”。比较可取。
- ⑥⑪同注⑤⑨，史药房撰：《送勿轩先生归武夷序》。
- ⑥⑫同注⑤⑨，丘锡撰：《鳌峰书院记》。
- ⑥⑬嘉靖《建阳县志》卷十二，《儒林传·熊禾》。按，此传所列书目，丘锡撰《鳌峰书院记》所列的，也包括在内。
- ⑥⑭许天锡撰：《鳌峰书院记》，见魏时应修、田居中纂万历《建阳县志》卷二《学校·鳌峰书院》。
- ⑥⑮《熊勿轩先生文集》卷一，《史纂通要序》；注⑤⑨，丘锡撰：《鳌峰书院记》。
- ⑥⑯见注⑤⑨所引熊禾《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附见资料。
- ⑥⑰同注⑤⑨。
- ⑥⑱嘉靖《建宁府志》卷一八，《熊禾传》。
- ⑥⑲民国《建阳县志》卷九，《艺文》。
- ⑦⑰熊禾文集的版本流传情况，成化三年吴高所作序现存本伪为至正十七年许衡作序问题，以及此事和熊禾被提名从祀孔庙未获成功之事的关系，详见《元儒熊禾的学术思想问题及其从祀孔庙议案》。
- ⑦⑱《文公先生小学集注大成》原书六卷，北京图书馆藏有宣德九年梅隐精舍刊本，存首三卷。《四书标题》原书十九或二十卷，原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藏，今存《论语》卷二至卷四，《孟子》卷五卷六，共五卷。
- ⑦⑲熊禾早年已经提及胡瑗之教，见《熊勿轩先生文集》卷五，《谢乡举论学》；晚年提及的，见同书卷三，《晋江县学记》。
- ⑦⑳①《熊勿轩先生文集》卷一，《送胡庭芳后序》。
- ⑦⑳②《勿轩集》卷七，《闽崇安县学立碑》。
- ⑦⑳③《熊勿轩先生文集》卷六，陈蒙正撰：《送退斋东归序》。
- ⑦⑳④同上书，卷首，张伯行撰《原序》。
- ⑦⑳⑤同注④⑥。
- ⑦⑳⑥同注②⑨。
- ⑦⑳⑦《明宪宗实录》卷五四，成化四年五月戊子。
- ⑦⑳⑧同注④⑥。又，嘉靖《建宁府志》卷一七，《学校·鳌山〔峰〕书院》条作嘉靖十五年重建，命建官员也非同入。
- ⑦⑳⑨民国《建阳县志》卷八，《祠祀·鳌峰书院》。
- ⑦⑳⑩嘉靖《建阳县志》卷五，《秩祀·大儒祠》。
- ⑦⑳⑪民国《建阳县志》卷八，《祠祀·大儒祠》。

⑤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四书标题十九卷”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37页。

⑥丘浚《学的》已经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6册）。有关此书的研究，见朱鸿林《丘浚〈朱子学的〉与宋元明初朱子学的相关问题》，林天蔚编：《岭南文化新探究论文集》，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1996年版，第63—79页；《〈朱子学的〉的流传与评价》，《史苑》第2卷（1996）。

(冀)登字 006 号

书名题签:顾廷龙

封面设计:张金涛

责任编辑:邓子平 郝建国

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

《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编委会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地矿部河北地勘局测绘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16 50 印张 插页 1 张 1160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120 元

ISBN7-5434-3348-6/K·73